

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及对毛泽东的影响

郭凤莲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同任何其它文化一样,湖湘文化也有负面性,这种负面性根源于其历史、自然的环境和自身的特质。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主要的,但负面影响也同样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晚年,毛泽东出现的失误都可以从文化因子上找到原因。分析这些并非否定湖湘文化或毛泽东的功绩,而是坚持一种辩证的、客观科学的态度。

关键词:湖湘文化;毛泽东;负面影响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地域和历史时期形成的,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民族传统、民族习性和审美观念而显现出独特性,没有独特性的文化不成其为文化。而同时任何一种文化由于受环境诸因素的影响,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因而呈现出多元状态:既有优秀的一面,也有缺陷的一面,只是优秀的一面占据主导地位,缺陷的一面处于从属地位,否则这种文化就不能安生立命,终被历史淘汰出局。而且文化的缺陷是种相对的存在,在不断改变的社会历史环境或在异质的文化视野与评判中,一些文化特性的东西才成其为缺陷,唯其如此,文化的交流、互补和融合才成为可能和必要。

一

作为在湖湘大地上产生的湖湘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支流之一,它在近现代以来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对这种文化特质的归纳总结不乏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大成先生在其著作《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中所作的高度归结:一是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三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四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五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1]209-221}以往研究者较关注的是湖湘文化的正

面效应,这也是基于湖湘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积极的效果和良好的影响。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诸如曾国藩、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应运而生,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积极效应的掩映下,人们对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则较少提及。应当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积贫积弱、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为日趋富强、安定团结的时局代替,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为经济建设的和谐社会所取代,在这种新的社会历史境遇下,人们对湖湘文化的一些负面因子的研究日渐增多,在肯定湖湘文化优秀面的同时,又对湖湘文化的负面性予以认识和思考。首先让我们来分析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及其产生的根源。

从湖湘文化产生的源流看,湖湘学派的形成起源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主要创始人是胡安国、胡宏和张栻。“北宋末年,由于金兵入侵,大批学者文人南渡避乱,造成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特别是胡安国父子‘避乱荆门’,后又讲学南岳,因而有‘湖湘学派之盛’,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1]14}他们虽不是湖南人,但在湖南创办书院传播学术,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以“湖湘”称名的地域学派。朱熹最早称胡、张一派为“湖湘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提及“建炎之乱,安国避地荆门”,遂有“湖湘学派之盛”,

收稿日期:2008-02-29

作者简介:郭凤莲,女,湖南桂东人,湖南工业大学副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思想。

正式将胡、张定为“湖湘学派”,以后诸多学者名流都接受和采用了这一称谓。

湖湘文化产生之后,经历南宋动乱,湖湘精英在乱世中大多牺牲,文化遭受摧残,此间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沉寂局面,直至王船山,局面为之一变。王船山出现于明末清初之际,也正当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新的民族大灾难之时。“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往往都处于民族矛盾尖锐突出,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而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民族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2]从湖湘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到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毛泽东,湖湘文化的热血男儿们,无不在为改革旧的政治弊端,拯救民族危难而殚精竭虑,他们的用心都倾注到民族存亡的政治问题上。在动荡不安、民族存亡的时刻,需要也只有先解决这些生存的政治大问题,才有可能再去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这些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没有机会将心思用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上,因而缺乏经济建设的思考和锻炼机会,长期的惯性作用,湖湘文化的“政治思维”模式压抑或取代了“经济思维”模式。到了和平建设年代,热衷政治,不重经济,就成为湖湘文化不能与时代合拍的缺陷之一。

同时,“由于湖湘学产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秋,的南宋,一开始就具有浓烈的御外民族情结。加上内陆省份的位置,闭塞的交通障碍,从维护民族传统出发,人们往往易于产生强烈的排外心理,拒斥外来新兴事物,缺乏开放精神。”^[3]湖湘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不乏例证,特别是近代,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蕴含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浓郁的民族情结往往易于产生强烈的排外心理。一位外国传教士曾惊呼湖南“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出现了对于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所以,在中国其他省份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4]事实上,至1886年仍未有一个传教士进入长沙。湖湘文化这种爱国爱家的“民族情结”有其可取之处,在抗金、抗元、抗清和近代以来的反帝斗争中,都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到来,这种缺乏开放性的封闭保守成了湖湘文化的又一缺陷,不能从国家和民族最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从而影响国

家走上富强之路,难以迎接世界现代文明的挑战。

从湖湘文化精神特质来看,其中蕴含着一种敢于拼搏,悍勇顽强,敢打硬拼的“霸蛮”精神。湖南曾经是“四塞之地”,民性多流于倔犟。粟戡时评说道“湘人性素好动,尤饶侠气,平时毫无异人之处,一遇压抑,则图抵抗,每以生命为孤注。”^[5]你看,王船山,隐居山洞,含辛茹苦40年,写成大量著述,是霸蛮!曾国藩,一生坚守“硬字诀”,率领湘军“扎硬寨,打死仗”,屡败屡战,最后打出无湘不成军,是霸蛮!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领二千子弟与袁军死战,是霸蛮!他们不怕鬼,不信邪,“打脱牙齿和血吞”,“不到长城非好汉”。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热烈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湖湘历代知识分子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再结合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民风,使湖南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一大批革命家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所表现出的伟大气概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更是感天动地泣鬼神,光耀日月!

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和平建设的环境,这种独尊独断、固执己见的霸蛮精神,也往往使人容易脱离实际,滋生保守与虚骄之气。片面夸大人的精神意志的力量,发展到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忽视制度及法规建设,从而造成工作中的巨大失误。有人说湖湘文化是一种逆境文化,的确不无道理。在打天下的时期,湖湘子弟敢打敢拼,显示了湖湘文化的风采。而在守天下的时代,在商场这个另类的战场,需要的是商业经济的思维和智慧,霸蛮精神时常彰显出缺陷而需要调节和补课。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地域环境对湖南人的精神性格以及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湖南的东南西三面山岭盘绕,只有湘北为洞庭平原和湖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形如向北张开的马蹄形,完全成为典型的内陆省份。在交通与通讯极不便利的时代,湖湘文化不象我国沿海地区的岭南文化、江浙文化那样便于海外贸易和吸纳外来的海洋文明,相反它对沿海的经济与文化形成了阻隔作用。“西方文明在湖南的传播也不如东南沿海。地理环境对

湖湘文化与欧美文化交流的阻扼机制,造成了一种不如沿海文化那样富有开拓扩张精神,而较为稳固的保守型文化。^[7]这种评说是较为中肯的。加上环境气候极适宜于粮食作物的种植,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但棉麻丝茶等经济作物不甚发达,工商经济相对落后,商业文化氛围相当薄弱。地域的闭塞,带来了思想的闭塞,人们的性格特点不是外向热烈,敢于冒险,而是稳重保守,安于现状,难以冲破传统和习惯的桎梏,创新意识相对缺乏。他们视农业为根本,看不起商业,象王船山就曾呵斥“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夺之”,严厉批评经商活动。湖南人的关注点在农业不在商业,在政治不在经济,还与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中部地理位置相关,它是跨越东西、贯通南北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政治军事斗争异常激烈,对湖南人的影响十分深远。洋务运动的迟迟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步履蹒跚,市场经济的缓慢行程,无不证明了这种情状。所以,湖南的环境与区位特点,是产生湖湘文化闭塞、保守与重农轻商这一负面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浓厚的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学、宗法制观念,也是产生湖湘文化负面性的原因之一。湖南向北敞开的地形特点,便于中原传统文化的长驱直入。又由于湖南的相对闭塞和保守,让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繁殖下来,而这种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便是儒家正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与宗法伦理的结合体,它们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不少湖湘精英把经天纬国的民族大业当作少数宗族、乡梓、亲信、心腹之事,缺乏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表现出强烈的排他心理,过份注重亲情友情而忽视纪律和制度建设。事实上,从胡安国、胡宏、张栻到王船山,湖湘文化就一直尊崇程、朱理学,强调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观,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和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曾国藩对封建道统在湖南的稳固深入更是功不可没,有论者分析说“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一方面使一部分湖南人得以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成为倡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另一方面,又使曾国藩更加坚信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是理学对西教的胜利,因而曾氏兄弟在攻下天京后,大肆刊刻《船山遗书》,利用他的重‘礼’尊道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湘军将领还通过大修地方志和为湘军阵亡将领建立专祠等多种形式,来宣扬湘军的‘忠义’思想。经过这样大肆渲染,恪守封建忠义,护

卫传统圣道的湘军就成了湖南士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争先效法的众趋人格,‘卫道’也成了湖湘人士自觉的责任感。”^[8]儒家正统思想在湖湘文化中处处可见其突出的印痕,所以有人说“近世以来,湖南还是儒家文化在南方的大本营”;^[9]或说“湖南成为了一个维护纲常名教的顽固堡垒”^[8]

二

湖湘文化同其它文化一样有其负面性,在湖湘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湖湘文化对其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不言而喻,但负面影响也在所难免,忽视或淡化这种影响都是偏颇的非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从毛泽东一生经历来看,尽管后来他南征北战,革命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但其青少年时期完全是在湖南度过的,富有特色的湖湘文化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由于的个性特点和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成了湖湘文化的骄傲和杰出代表。可以说,湖湘文化和毛泽东的成就相得益彰,湖湘文化使毛泽东更光彩夺目,毛泽东则使湖湘文化更辉煌灿烂。当然,分析湖湘文化的负面性,我们同样也可以在毛泽东身上找到明显的印痕。

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难曲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正值他的青壮年时期,也是他一生革命事业最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此时他完全能够十分理智和清醒地面对复杂的局势,充分施展他的才华,让深根其骨髓中的湖湘文化中的正面因子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当时的中国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社会政治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时期,政治和军事斗争压倒一切,这种状况与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时的情形有明显的相似性,湖湘文化精神在较为适宜的境遇中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正面的作用,毛泽东身上那些湖湘文化的负面因子得以克制和压抑,所以我们在毛泽东身上看到的是湖湘文化光彩夺目的一面。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毛泽东也一步步走向其晚年,在青壮年时期形成的思想性格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因为过去的成功和现时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过去十分适合于政治动荡和军事斗争的湖湘文化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开始显露其不足,或者说至少还有一个调节适应的过程。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在毛泽东这位湖

湘文化杰出代表的身上得到了较充分的映现。归结起来,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政治斗争而忽略经济建设。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能力,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公认,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是毛泽东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他的英明决策和指挥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同样又在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对付外来压力如抗美援朝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卓越的表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但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权已基本巩固后,应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经济建设,从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让中国从动荡落后和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这样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政权。但毛泽东没有及时地从政治斗争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有时虽也有这类的想法,但政治思维还是压倒了经济思维,这是一种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也是骨子里湖湘文化重政治轻经济的潜在因子的作用。有论者说:“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阶级斗争’。可以说,毛泽东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0]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连接不断的政治运动,最后是声势浩大持续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也开展过一些经济工作但还是过多的染上了政治色彩,或者干脆让位于政治斗争,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于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除了缺乏经济意识之外,毛泽东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也让他缺乏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也就是说即使他想做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好,至少需要一段时日的探讨和摸索。当然主要的还是他头脑中缺少经济工作这根弦,因为即使自己不太懂经济工作,他还是可以启用经济工作方面的人才来做,可事实上没有。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就不乏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一些有经济头脑的精兵强将,毛泽东不但没有重用他们,反而还将他们以政治斗争的方式一个个打倒,从而造成中国经济建设的迟缓落后。也象湖湘文化中重视农业而忽略商业经济一样,毛泽东的政策不但不重视商业经济的发展,反而常常扼制商业经济的活跃,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毒草,要将其

割舍掉,物质的匮乏和流通的不畅已成了当时不争的历史事实。

(二)较为闭关自守而缺乏开放意识。前面已分析说明了,由于产生和发展于民族危难的历史时期,加上内陆封闭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湖湘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挤和拒斥的态度,这在毛泽东身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都属中华民族危难之时,新中国成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强盗的入侵;新中国成立后,是世界冷战的格局、西方阵营的强大压力。这些因素使毛泽东这位在湖湘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湖南伟人,激发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强精神。他一生除短暂地访问过莫斯科外,再无其它国外留学或访问的经历。对这种情况,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析,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位铮铮硬骨的湖南汉子的民族情结。不管怎样,他都有条件、机会和必要去国外考察访问,但他没有。现实的情况,尤其是湖湘文化中的民族气节,使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民族傲气和抗拒外族的情结。他曾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他身上,融汇传统,博通古今,是相当出色的。但“洋为中用”方面似乎除对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思想有较多的接受外,其它的融通事实上并不多。在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中,倡导的是不依靠外援。这与湖湘文化中不忘“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当年外国传教士在湖南难以立足,洋货受到强烈抵制,至民国时,外国人没能在湘设立一家近代企业,湘人也没聘一名外国技术人员。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受到冷战的国际环境影响,最后形成了与美苏对立、闭国自守的局面,不单在政治上对立,在科学文化、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是水火不容。这种强调自力更生,坚持民族精神有其可敬之处,但缺乏相应的灵活度,忽略了国际合作中互惠互利、共生互补的一面,从而失去了融入世界、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管理经验的机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封闭保守思想。当中国醒悟而打开国门时,才惊异地发现已远远地落人之后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封闭意味着孤独,封闭意味着落后。

(三)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略客观规律。湖湘文化中的霸蛮精神在毛泽东身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这种精神为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并最终建立社

会主义新中国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为革命,一个又一个亲人壮烈牺牲,他没有动摇,一次又一次面临死亡危险,他没有气馁。毛泽东不愧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建设尚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冲劲蛮劲并没有减弱。或许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使他失去了应有的冷静,或许是他身上浪漫的诗人气质在发挥着作用;或许是年岁的流逝使他充满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总之毛泽东身上蕴含的湖湘汉子的霸蛮劲得到了激发。“他不太看重物质或组织的作用,独视人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宝贵的因素,而人之所以宝贵,不在于其体能或理性,而是其意志和精神”。^[1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的是意识的决定作用,试图重建个人魅力型的组织系统,凭借人的意志力量、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以期实现他理想中的新秩序。在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毛泽东“快马加鞭”地搞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让全国人民热热闹闹地吃起了大锅饭,还轰轰烈烈的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并希望在较短时间内赶上英美,尽早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做出了一些有违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可笑之事。在霸蛮精神的作用下,他忽视了制度和法规建设,使民主和法制受到践踏。他意气用事,急于求成,甚至还听不进他人的意见,蛮劲十足,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被他赶下台去,政治运动更为复杂化。

本文对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及其对毛泽东的消极影响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湖湘文化或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而是用一种

辩证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完美无缺,而要与时俱进,进行一定的调节和完善,湖湘文化也不例外。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其晚年出现的一些问题,并非出于恶意或人格方面的问题,而是可以在有关文化因子方面找到原因。或者说,有其潜在文化负面因素诱导的必然。

参考文献:

- [1] 彭大成.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2] 郭凤莲, 刘忠洋. 论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 (1).
- [3] 谭长富, 康化夷. 湖湘文化的反思 [J]. 求索, 2004 (6): 150 - 152.
- [4] 何中石. 朱阎基 [M]. 北京: 远方出版社, 1998: 18.
- [5] 栗戡时. 湖南反正追记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2.
- [6]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M]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92.
- [7] 谭咏秋. 封闭保守 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 (1): 88 - 91.
- [8] 许顺富, 廖素英. 论湖湘文化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J].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 (5): 18 - 21.
- [9] 周秋光. 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及其缺陷 [J]. 船山学刊, 2001 (4): 27 - 31.
- [10] 田慧武. 试论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史局限性 [J]. 韶关学院学报, 2004 (7): 44 - 47.
- [11] 萧延中. 晚年毛泽东 [M]. 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9: 311.

(责任编辑: 骆晓会)

empire

Key words: the Roman Empire; burden on the farmers; taxes

(8) **Negativity of Hunan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Mao Zedong**

GUO Feng-lian (068)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Like other cultures, Hunan culture (also called Hu Xiang culture) has its negativity. Its negativity derives from its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Hunan culture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n Mao Zedong. Mao's errors in work in his later years had some cultural reasons. This analysis doesn't intend to deny the contributions of Hunan culture and Mao Zedong, but sticks to a dialectical,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when making a judgement.

Key words: Hunan Culture; Mao Zedong; negative effect

(9)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Names of Towns Under You County**

PENG Xue-kai (079)

Teacher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ny of the thirty towns under You county, like Shalingpo, Xinshi, Jiubujiang, Yatangpu and Pinyangniao, are named after some famous buildings, bazzars and country fairs, and have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You county; name of the town; cultural implication; building; bazaar; fair

(10) **On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the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LIU Wen-liang (086)

Chinese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reen thought" and "ultimate concern",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appear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modern esthetics characterized by obsequiousness and revelry and has turned on a "green l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Exploration of the true meaning of "ultimate concern" has become the lofty task of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Appealing to men for a reunderstanding of their position in the entire ecological system, searching for the ideal road to a poetic living, awakening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anxie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value of survival form are the core of "ultimate concern" of modern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ultimate concern; ecological crisis; survival value

(11) **On Max Bill's Math-theory Mode of Variant Creation**

SHAN He-fei, WU-wei (093)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eader of concrete art in Europe, Max Bill breaks through bounds of artistic spirit and brings concrete art into a rational world of art through importing mathematical mode into it. His works give us a unique visual effect by using mathematical mode as the supporting point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